

清末欧洲旅客眼中的曲阜及其文化资产

[法]玛丽安娜·巴斯蒂德·布鲁盖尔 (Marianne BASTID- BRUGUIÈRE)

陈怡洁 译

19世纪中叶，黄河改道，之后又发生了太平天国之乱和捻乱，严重地破坏了进出山东内地的通道。有一小群意大利方济会传教士在几个城镇落脚，特别是在济南，有高大主教 (Monseigneur Cosi) 和一位代主教驻在那里，然而，他们几乎足不出户。¹直到1860年才有外国旅客踏上前往山东的旅途，并且抵达曲阜。事实上，1860年的条款允许持有中国当局核发的护照的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进出。另一方面，中国也开放了山东北部海岸的芝罘港(烟台)为通商港口，芝罘便成为许多海岸地形测量及陆地路线探勘计划的出发点。然而直到1900年，到过曲阜的外国人还是很少。第一批访客是在1861年1月抵达的英国士兵，随后，苏格兰传教士韦廉臣于1865年10月安抵当地。这段时期的访客，全部都是欧洲人，他们要不就是传教士，要不就是英国或德国外交官或政府官员。其中，许多人留下了详细的文字和图面描述。他们由于各种业务需要而来到曲阜，然而，都对中国的充满好奇心，并且熟知中国古典文学。在第二阶段，义和团之乱末期至1912年期间，因为交通便利许多，外国访客人数比先前多，来中国观光的国家及旅客也比较多样化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法国汉学家沙畹 (Édouard Chavannes, 1865-1918) 在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 (Vasili Mikhailovich Alexeev, 1881-1951) 的陪同下，于1907年在曲阜开始了有系统的考古研究。他们所发表的文献和证据，为曲阜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，从考古研究转向曲阜本身所扮演的神圣角色。因为他们的奉献，曲阜成了世界旅游指南中留名的观光景点。渐渐地，清末的欧洲旅客将曲阜带进万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文化领域中。

¹ 山东地区的宣教活动始于1636年，由住在济南的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 (Nicolas Longobardi) 写下历史的第一页，他在那里领了几位乡试举人信主。1650年，宣教任务交到西班牙的方济会传教士手上，由他们接续在山东传福音，直到1797年。自从1690年教廷在北京设立了一位主教后，山东就依附在北京教区。自最后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去世后，直到1839年间，山东地区都没有长驻的外国基督教传教士。1839年，随着耶稣会宣道士重返中国，教廷决定重新分配各个宗教团体的责任区，每个组织各有一块专属的教区，以避免冲突。山东地区于是从北京教区脱离，立了一个副教区并且委托给意大利方济会管理。起初，他们只有二位传教士，住在济南，其中一位是主教。中国又发生动乱，使得他们困守在城里；1861年，莫里诺神父 (P. Molino) 被太平天国的暴徒杀害，各种暴徒的攻击未曾间断。到了1862年，教廷在芝罘的外国人租界区设立了第三位传教士。